

21世纪中国散文的第一次感动采摘



21世纪散文典藏

(2000—2010)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21世纪散文典藏

(2000—2010)

谢大光 编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1世纪散文典藏:2000~2010/谢大光编选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02-008468-5

I. ①2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5751 号

责任编辑:杜丽 装帧设计:何婷

责任校对:常虹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2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2

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8468-5 定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【 2010 】

纪念王泗原(叶兆言)	1
漂流者(孙郁)	6
墙上的墙(苍耳)	23
没有破解的谶语(铁穆尔)	28
再见,原配的世界(王开岭)	34
一块土地(贾平凹)	43
难忘的燕京岁月(刘德伟)	51
上帝,也送我一把小提琴(文婧)	69

【 2009 】

隐形埋名(范晓波)	85
影子(王月鹏)	90
富锦的梦想(阎连科)	97
二〇〇八上课记(节选)	
——他们的困惑和我的困惑(王小妮)	104
陈姑娘,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(章诒和)	113
冯亦代之悔	
——读冯亦代《悔余日录》(朱正)	119

【 2008】

转身(塞壬)	132
墩麻扎村禁地(刘亮程)	144
怀念耿庸先生(林贤治)	152
鹿(王族)	160
夏至(周晓枫)	167
北京册页(习习)	186
天使寻访记(阿贝尔)	194

【 2007】

何谓日常生活	
——以昆明为例(于坚)	201
怎得长相依聚(宗璞)	207
地中海边界(张承志)	212
百灵(王世襄)	219
常熟之秋	
——关于柳如是(黄裳)	223
敦煌七里镇看树(第广龙)	229
孩子们(李娟)	235

【 2006】

山南水北(节选)(韩少功)	243
无人看见的城市生活(傅菲)	249
江上的母亲	
——母亲失踪十年祭(野夫)	256
我不曾识见曾梦见(潘向黎)	266

兄弟(陈霁)	270
笔记/笔记(节选)(黄一鸾)	278
怀揣植物的人(王晓莉)	285
 【 2005 】 	
生命需要等待(詹克明)	290
自由不是免费的(刘醒龙)	294
好时光悄悄溜走(迟子建)	302
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(史铁生)	308
 【 2004 】 	
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(魏徽)	313
下江人(戴明贤)	320
桧溪笔记(雷平阳)	327
对一种沉静的怀想(汤世杰)	335
泥与焰(节选)(黑陶)	343
 【 2003 】 	
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(裘山山)	347
永生羊(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)	353
等待清洁(朱以撒)	361
筑万松浦记(张炜)	368
勺园花木(舒莞)	379
失踪的生活(夏榆)	385
丧乱(朝阳)	391

【 2002 】

陪考一日(莫言)	404
捕蝶者(筱敏)	409
我的大舅舅(王安忆)	414

【 2001 】

麦田中央的坟(外一篇)(谢宗玉)	422
我跳舞,因为我悲伤(冯秋子)	428
一次没有表白的爱(朱鸿)	439
人倚松门(方方)	450
生命的节日(季栋梁)	457
大树和我们的生活(周涛)	462
夜里戴草帽的人们(黎晗)	466

【 2000 】

春雪化时(鲍尔吉·原野)	469
祖先的深度(节选) ——古盐井札记(张锐锋)	476
藏羚羊跪拜(王宗仁)	503

纪念王泗原

叶兆言

王泗原先生见过很多面，衣着朴素，看上去很干瘦，愁容满面，虽是长者，却不多见言笑。享誉学界，后来也有人以国学大师头衔相赠，与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相比，这位王泗原还算不上大名鼎鼎。他是祖父的老部下，也是祖父最信任的人，有人甚至把他戏称为叶圣陶的左臂右膀，年龄要比我伯父还大，应该是比吕叔湘先生略小，如果活着，差不多也有一百岁了。

王泗原送父亲的书，居然称“至诚”兄，这让人觉得很搞笑，父亲也觉得太过客气，毕竟他要比父亲年长许多岁，而且学问太高太深，而且他是那样的严肃，因为严肃和不苟言笑，要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很多。说老实话，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王泗原出生于哪一年，上网去搜索，没想到宣传条目不少，吹捧文章也有好多篇，出生年月还真一时找不到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祖父病重住院，院方规定每周只有三个下午可以探视，王泗原关心祖父的病情，又不愿违背医院规定，便改成每天去家里咨询，向轮流陪同祖父的家属打听情况。照例是问昨晚睡得如何，体温可好，胃口是否开了，然后说一声这很好，也不喝一口茶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。大家都觉得这老头十分古怪，天天都如此，其实打一个电话就行，可是谁也不敢这么提醒，有些话一说就俗了。说给祖父听，祖父也很感慨，只能用“真是个古人”来评价。

我考上大学，祖父很认真地说，我们老开明的人，是看不上什么大学生的。这话伯父说过，父亲也说过，让我觉得很奇怪，相当长一段时间不

明白什么意思。祖父不是大学生，伯父和父亲也不是，狭隘地想，因为他们不是，所以难免有吃不着葡萄的心理。后来明白不是这样，对于老一代人来说，不上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譬如祖父就是因为要养家糊口，没钱上大学，伯父因为高考时患猩红热耽误，父亲上了大专没几天就去革命。按照我的傻想法，大学之门进总比不进好，有无学问，与上大学并没有太大关系，只是世上有文凭的人多，大学生研究生如过江之鲫，真有学问的人太少，以学历和文凭取人，看走眼是经常。

其实执着于文科的人，完全可以在家自学。王泗原倒是考上过大学，因为家贫，很快退学，他的学问功力，一方面得自家传，一方面全靠自习。说到学问好，祖父经常称赞与自己相熟悉的两位，一位是吕叔湘，一位就是王泗原。坦白地说，我最后没有走上做学问的道路，既与喜欢写小说有关，也与那些有学问的人太有学问有关，活生生地是被吓住了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做学问，这两位实在是太认真太厉害，认真得让人没办法效仿，厉害得可望而不可即。学问是人做的，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。

王泗原出身名门，世代书香，祖父王邦玺是进士，写一手很好的字，与湘人名流王先谦同科，曾任国子监司业及光绪皇帝的南书房行走。也绕不明白这“司业”和“行走”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官，反正是在皇帝身边，侍候着天下第一号人物，有很多可以说的掌故。王泗原偶尔也会透露一些，譬如关于老佛爷慈禧，与外面传得就不太一样，听上去更像一位邻居老太太，我父亲生前常说，王泗原要是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都写出来，会非常有意思，可惜他并不太喜欢与人家卖弄这些破烂。家道中落是乱世的必然，王泗原的祖父得罪了李鸿章，然后就是被贬，告老还乡。老人家讲经学，在王泗原出生时已过世，因此对王的影响并不太大，影响大的是父亲王仁照，他当过师范学堂的监督，这职务在晚清相当于校长，讲究文字声韵训诂，教子甚严，教导儿子的首要认识，就是“做学问是一种责任”。

王泗原做过小学和中学老师，做过很长时间编辑，这两项工作都很普

通,却说明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脚踏实地,都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成绩。当然麟角凤毛,通常只对老派的人才有效,真正脚踏实地,不受人间影响和诱惑又谈何容易。现如今中小学的师资队伍,多如牛毛的各路编辑,真正能做出王泗原这样学问的人,怕是再也找不到。时乎时,不再来,时代变了,人也全变了。我也说不好王泗原有多大学问,只好借别人的眼光,我祖父的观点不能完全作数,说一说张中行先生的评价。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,积累很厚、学问过人,又是王泗原几十年相处的老同事,评价可算是知根知底。他觉得王泗原“有所作就重如泰山,甚至压倒古人”,觉得他的文章“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”,因此,那些想走上古典征途的人,请先细心读读王泗原的书,“当作厉兵秣马,以免仓猝登程,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”。

最早见到的是《离骚语文疏解》,这是王泗原的第一本书,显然是一本很难读进去的书。虽然至今我还能马马虎虎地将《离骚》背出来,可是对于这本“疏解”,还真是一读就坎坷,一读就明白自己的学问太差。在书的空白处,王泗原写下了一大段文字,对祖父表示谢意:

圣陶先生:

这本书出版了,我带着感激,拿第一本样书送到您的面前。

一九五〇年的冬天,您从我交给组织上的自传里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。您亲自到我办公的地方,亲切地问我,说想看看。我写信到上海取来,请您教正,您看过了,说可出版,并介绍到开明书店。您多次谈到它,有时候有一两句称许的话,我听了只低着头,不能说什么,我不敢用虚文来对答您的那样质朴的话。稿子整理过后,适逢开明书店出版方针变更,您又介绍到俞平伯先生和文怀沙先生。付排以后,每一次见面,您总是很关心地询问排校的情形。您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比我自己还多。这使我深深感念,永远不忘。

泗原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

祖父对王泗原的欣赏非同寻常，常以平生获此得力助手而自豪。这段文字还可以续写下去，一九七一年，跟钱锺书先生一样，王泗原也从干校回到北京，在与祖父的闲谈中，说起昔日研究典籍的种种独特感悟，祖父觉得很有意思，力促他将这些感悟写出来。当时环境下，写下这些感悟，基本上自娱自乐，至多也就是惠及友人同好，因此王泗原也根本无意写作。因为祖父的建议，他“勉思所以报命”，把它们当作随笔写，或长或短，每写了一二十则，便送来给祖父看，让祖父提意见。起初是十六开白纸钢笔写，每则另页，后来写多了，有些零乱，祖父很喜欢这类文字，提出要分类装订，自报奋勇乐意为他效劳。奇文共赏疑义相析，一来一往，就是很多年，祖父对这些文字始终“深致奖誉”，渐渐老眼昏花，王泗原又改毛笔纸墨，用大字抄录送来让祖父过目，再到后来，祖父目力更加不及，只好改为口述，每次三五则，一句一句议论。

终于完稿，终于成书，这就是后来让学界感到震惊的《古语文例释》，所谓集四十年之深厚功力，洋洋洒洒的四十万言。王泗原就先秦两汉典籍的疑难问题，一一作了辨析，提出正确的解释，对真正有志于研读古籍的人会很有帮助。王泗原著作并不多，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，还有一本《楚辞校释》，凡是熟悉王泗原的，无人不敬佩他学问精详。然而他的过人之处，还不仅仅是古汉语的研究深入，现代汉语的功力也是十分了得。

王泗原的白话文非常漂亮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像毛笔字的一手正楷，炉火纯青出神入化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在从事教材的编撰工作，当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手云集，谈笑皆鸿儒，王泗原之外，还有张中行，还有张志公，还有隋树森，都是一时俊杰，他们这些人为语言文字所做的努力，默默无闻的贡献，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道白。还是用一句最简单的评价，人教社的教材关系到全国的中小学生，只要是“王泗原看过的稿子，大家就放心了”，他是把守文字大关的最后一个守门人。

王泗原曾当过胡耀邦的家庭教师，每周上门为其授课，自然是专车

接送,但是他坚持只在远处的胡同口上下车,不让接送的小车开进胡同,以免过分张扬。这就是他最典型的迂腐之处,胡耀邦敬佩王泗原的学问,执弟子礼甚恭,他却从不以此为炫耀,终生不改布衣本色。

(原载《南都周刊》2010年第364期)

漂 流 者

孙 郁

一

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，写好它不容易。明代以来，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，有的已成经典。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，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，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，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。刘侗、龚自珍、陈师曾都是外地人，他们对北京的描述，传神里透着哲思。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《二马》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，京味作品才越发醇厚起来。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。记得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，好像一幅幅画，真的美丽。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，并不久居京城。于是便得到结论：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。

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于此人的眼光吧。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，知道他一直出进于帝京，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。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，友人祝贺季羨林米寿，许多人聚在一起。那一天上演的是京剧《空城计》，颇为好看。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，并写了旧体诗一首。大家都说这诗好，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。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，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，都很有意思。他人在上海，却对旧京充满感情。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，

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。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，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。北京的人文地理，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。

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，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。倒是久居城里的人，对此不太在意了。他的许多文章，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，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。也由于他，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字，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。北京这个地方，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。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。

多年前看了孙犁的一篇文章，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，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，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，仿佛自己也有过。身处异地，举目无亲，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，是大不易的。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北京已改叫北平，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，大约也是寻异路的。可是环境毕竟太坏，自己并不适应，便悄然溜回故土，做别一选择了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也是这样的，从内蒙流浪到古都，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，对自己多是嘲笑，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。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，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，不是没有原因。在没有出路的地方，大火要烧出来的。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，发现了类似的经历。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。似乎也遇到问题，碰壁是必然的。梁斌在文章里写道：

一九三二年，母校解散，失学失业了。一九三三年，正是我二十岁那年，流浪到北京，住在二姐家中，还是想入学读书。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，我搬去住了几天，那简直不像个中学：教员少，学生也少，是才成立的。有人建议，叫我上郁文大学，混个文凭。考了一下，还真考上了。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，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，觉得很不光彩，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？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也上不起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走我自己的路，到北京图书馆自学，专攻文学。

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。失业是大痛苦，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。所以要留在城里，必须要有靠山，或投亲，或靠友。一无所有者，只能回到故里。勉强留下来的，都挣扎着。偶有幸运者，也是遍体伤痛。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，实在是不胜枚举。

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，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，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，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。即便是名校的学生，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。他们毕业后，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，教书或做职员、记者之类，都是一种选择。但对旧京的一切，似乎也难以进入，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。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，颇不习惯。他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，心情是寂寞的，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，竟生出悲凉的感觉。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，也就随军而去，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。

离开北平的愤怒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，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。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，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。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，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。三十年代的青年，毕业后厌恶为官，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。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，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，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。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，自以为是快乐的。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，仿佛精神高于一切，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。我看他与废名、杨晦的通信与交流，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。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。

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。无论是从外省到帝京，还是从帝京到外乡，中国的读书人在流动着。以台静农为例，忽而厦门，忽而北平，忽而四川，忽而台北。居无定所，精神一直游荡着。我读着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《辽东行》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描

述，心想，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，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。在路上的人，是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。而那时候的人，是没有家的定所者多。即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，大多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人。而出走，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。

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，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，成了日后京都的美妙的瞬间记忆。陶醉在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，则因士大夫的自恋，有点遗民的味道，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。没有被记载的北京，可能更贴近真实，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。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里，不易被察觉到。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，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在。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，溅出了丝丝血色，这把沉郁的古都，变得有温度了。

二

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。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。

一部分是求学来的，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。还有些毕业即失业的艺术求索者。帝京老气横秋，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。废园之外，欧风偶可感到，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，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。

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，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，都很特别。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。毕业失业了，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，留下诸多故事。有做学术梦的，有的是行吟的诗人，印象是潦倒者居多。他自己就因为没有工作，从外地回到古城，在同学的宿舍借住，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等着明天。这种没有工作的苦，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怅然难去的。

年轻的时候读到韦素园译过的诗，寒气习习，有点恐怖的味道。那样寂寞惨烈的文字，像似从安德列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出来的。他也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，在挣扎里给昏暗的旧京带来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。

可怜死得太早，惜乎不得展示才华，流星般地沉落了。

关于他的身世我一直好奇。这个短命的青年有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气质。韦素园是安徽人，一九二一年曾去俄国，不久回到北京。他在北京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。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，与弟弟韦丛芜一起在北京求学。他们的生活，主要由其兄资助。一九二四年，长兄突然逝世，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。按哥哥的遗嘱，希望兄弟两人结束在北京的漂流，回到老家过日子。然而韦素园、韦丛芜坚持在北京苦读，以微薄的资金，维持着他们的生活。

在最清贫的时候，他们结识了鲁迅。而且很快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。那时候他们沉浸在翻译的快感里，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行。韦素园、李霁野、台静农、曹靖华、韦丛芜在这个平台上做了许多趣事。在北京荒凉的地方，那些文字像一豆烛光，在无边的黑暗里闪烁着。

不善言语的韦素园，在译介上用力很勤。他自己写的文字不多，但所译果戈理、契诃夫、柯罗连科、梭罗古勃、屠格涅夫、安德列夫等作品，都很传神。那些作品的特点都有些苦楚，气息是冰冷的，而背后却有一丝丝热血涌动着。他那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连自己的气息都有类似的味道。以致鲁迅对他都有些喜欢，觉得是未名社里最真的人。

译介的出版给他们带来了一点收入，彼此也可以在京城站住脚了。但不久就是不幸的事情出来，韦素园患重度肺结核住院，几乎无法工作。我读到他在西山养病时给李霁野的信件，内容十分的沉重。比如劝大家节俭，注意身体。也担心这些漂在城里的青年因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。他在西山养病时的文字极为肃杀，有着俄国诗人的灰暗与忧伤。我看了他和友人那时候的文字，快活的不多，差不多都染上了类似的伤感。为什么如此，或许与经历有关？总之，他们的清冷的文章是有末世的哀凉的。

未名社聚集着一些有信仰的人。他们漂在北京，各有不同的原因。李霁野是文学青年，韦素园有着翻译家的梦，台静农大概要成为作家吧。唯有李何林不同，是因为参加暴动失败而流浪到这里，有政治避难的一